

外国  
中篇小说  
译丛

# 炸弹宴会

[英] 格雷厄姆·格林 著

屠 珍 译



外国中篇小说译丛

# 炸弹宴会

[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珍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Graham Greene  
Doctor Fischer of Geneva  
Or the Bomb Party

---

本书根据 Simon and Schuster Publishing  
House, New York, 1981年版译出

炸 弹 宴 会  
(英)格·格林著  
屠 珍 译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55/16面页3字数100,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

书号：10151·802 定价：0.88元



[英]格雷厄姆·格林

## 前　　言

格雷厄姆·格林 (Graham Greene) 是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他的作品，如《沉静的美国人》、《问题的核心》和《人的因素》等，已先后译成中文；另外根据他的同名小说《第三个人》改编的电影最近也在我国放映过，为读者和观众所熟知。《炸弹宴会》则是他一九八〇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

格林一九〇四年出生于英国中部赫特福德郡的伯肯斯特德的一个中学校长的家庭，一九二五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历史系。他在伦敦《泰晤士报》社任副编辑四年，一九二九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内心人》之后就成为一名自由撰写人，从此开始了作家生涯。

五十多年来，他著述甚多，迄今已发表三十多部作品，包括小说、戏剧、游记、短篇小说集和论文集等。他一九四八年发表的《问题的核心》

获英国泰特·布莱克纪念奖，使他赢得了国际声誉；剑桥大学和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于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先后颁发给他博士学位和荣誉会员奖。此后，他曾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都因他的某些观点不合该评委会的心意而落选。一九八三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又授予声誉远远不如他的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引起西方评论界的不满，认为格林未获奖真是太不公平了。

格林在年轻时曾一度是英共党员，后来，在一九二六年皈依天主教。尽管如此，他在创作态度上却一直同情贫困的下层社会人民和思想左倾的主人公，而没有象一般天主教知识分子那样倒向右翼。三十年代，他曾同西方左翼作家一起在作品中反映当时西方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威胁，如实描绘那充满虐政、暴力和不平静的社会。四十年代初，他根据亲自调查的情况，写成一部描绘墨西哥当局驱逐教会、追捕神甫的小说《权力和荣誉》，颇受读者的欢迎，并获得英国霍桑顿文学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从事外交工作，曾被派往西非、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地，因此他战后发表的小说大都涉及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诸如《沉静的美国人》（1955）描绘抗法战争时期的越南；《我们在哈瓦那的人》（1958）写巴蒂斯塔独裁统治下的古巴；《人的因素》（1978）写

的是国际间谍组织的阴谋。总之，他一直密切注视着国际上的重大事件，从中撷取素材，经过酝酿，构思成书。

他的作品里总是不断出现战争和革命、罪犯和警察、搜捕者和被追捕者，交织着正义和非正义、忠诚和背叛、信任和怀疑等等因素，这是因为格林认为二十世纪的西方世界充满暴力、恐怖和残酷等现象。他对西方文明、社会制度和传统都表示一定程度的异议，而支持反对专制和压迫的斗争，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他在探讨善与恶的斗争时曾说：“恶在人间畅行无阻，而善却不能再在世间漫步，”并为此而感到忧虑，因此他的某些作品不免蒙上一层对人世悲观的色彩，尽管其中也蕴含着劝诫的涵义。

在创作手法上，格林早期摒弃了二十年代盛行的唯美主义，一度试用过“意识流”技巧，但未获成功，后来就采用直爽、简洁而通俗的文体，注重情节的安排，通过行动描写人物性格。他还运用了新闻报导的电影剪辑手法以加强效果，有时甚至采取格调较高的惊险、侦探小说的形式，把一些具有深远意义的道德问题加以戏剧化，从而形成他的一种独特而引人入胜的风格，使他的小说总能立刻勾起读者的好奇心。

《炸弹宴会》出版后，西方评论界褒贬不一。

评论家罗勃特·陶厄斯认为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一个近乎讽喻和告诫的故事，作者以极其扼要的方式探讨了贪婪、傲慢和失望……其中的人物很象一幅十六世纪的木刻上面所刻划的一出道德剧中的芸芸众生。”<sup>①</sup>另一名评论家迈克尔·毛肖说这部小说所涉及的主题包括失望、孤独、自杀、死亡和对宗教信仰的困惑，而且可以把它看成是格林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在他的小说中阐述的各种主题的一个缩影。他还评论道：“费希尔博士只有一种情感，那就是他蔑视人们，而且具有一种疯狂的权力欲望，要探索人类的贪婪是否有个极限。他的宴会不外乎是一种试验室里的实验，他把富人的五脏六腑统统翻腾出来剖析，把他们保持尊严的伪装剥得一干二净……小说中的人物，甚至那些次要人物，都显然是真实的，作者的文笔简练且富有诗意。”<sup>②</sup>当然也有些评论家认为格林只不过写了一部“古怪”的书而已。

可以肯定，格林并不是远离社会现实而抽象地去探索“贪婪”及其“极限”的。小说中的富人各自的经历迥异，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贪婪，是不择手段、不惜出卖自己的一切的贪婪。这种

① 见《纽约书评》1980年第10期，第23页。

② 见《新政治家》中《多种多样的贪婪》一文，1980年3月28日1期，第477页。

贪婪正是资本主义使人产生异化的一个方面，因而不论其出身如何，他或她都可能变为这种卑鄙的人。从另一个角度看，那些保持了自身的高洁，从而抵制了资本主义那股异化力量的人们，则往往不能称心如意地过上洁净安宁的日子，因为他们是无法抗拒这种无孔不入的制度的压抑的，所以他们不是死亡，就是失望，或者孤独，象小说中自杀的安娜，以及虽生犹死的斯坦纳和琼斯，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读者从中很可以领略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人生是何等的可悲可哀。

比较难于理解的要算费希尔博士的形象了。作为金钱万能的体现者，象费希尔这样的人，无疑也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他手中握有巨额财富，同时也就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取笑阔人，使穷人丢掉工作，使全社会都栗栗畏惧。与此同时，他变成了一个极端自私和冷酷无情的人。他对自己的妻子不要爱情，只要占有，由此引发了憎恨一切人的疯狂心理。由于他本人是个巨富，因而深谙富人的贪婪成性，为了报复，他拿他们的贪婪作试验，从别人的屈辱中寻求自己的尊严。而当这个用金钱铸就的魔王一旦耗尽了他的大部分财富之后，他不仅陷入了绝对的孤独，而且自身也丧失了存在的余地。这样看来，费希尔的死，应该是个合乎逻辑的结

果。

作家在运用语言艺术的手法上有一独特之处，就是有意识地在每本小说中反复运用一两个关键词汇来表达中心主题思想，在《炸弹宴会》里则是“贪婪”与“憎恨”。确实，格林在这部作品中以极其辛辣的笔调，淋漓尽致地嘲讽了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其深刻程度在当代作品中是少见的。此外，小说中还再现了作者一贯言简意赅、结构严谨、幽默诙谐等特点，使我们看到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作家的语言艺术更加精湛纯熟。我国读者无疑将会通过这篇佳作加深对这位知名的英国作家的了解。

译 者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 内 容 提 要

格雷厄姆·格林是我国读者较为熟悉的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本书是他近年来发表的一部新作。

故事发生在瑞士日内瓦城。百万富翁费希尔“博士”经常举办豪华的、别出心裁的宴会，赴宴者全系城里的阔佬名人。每次宴会，他照例先将来宾恣意戏弄、羞辱一通，然后赠给每人一份厚礼。最后一次，主人设下“炸弹宴会”，客人们须冒“被炸身亡”的危险，方能得到二百万瑞士法郎的巨额犒赏。于是，一群阔男富女进退维谷，演出了一幕穷形尽相的喜剧。

作品以精妙的构思、明快的笔触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有钱人冷酷无情与贪得无厌的本质。

—

我想，在我所认识的男人当中我最憎恶费希尔博士，一如在我所认识的女人当中我最爱他的女儿。我和她居然会相识，更不用提还结了婚，真可算是一件怪事。安娜一路易丝和她那位百万富翁的父亲居住在日内瓦郊区维苏瓦的湖畔一幢古典宏伟的白色府邸里，而我当时只在韦维<sup>①</sup>一家巧克力糖厂的玻璃大楼里充当一名翻译和小文书。我们之间相距何止一个小县城，而是十万八千里。早晨八点半，我便开始上班，而她还熟睡在一间粉红和雪白两色的卧室里呢，那间屋子据她告诉我就象一个婚礼喜庆蛋糕；晌午，我匆匆上街吃几块三明治权充午餐，她那当儿可能正穿着晨袍坐在梳妆台前整理头发呢。我的老板从他们销售巧克力糖的进项中每月支付我三千法郎薪

---

① 韦维是瑞士洛桑附近的小城镇。

水，我猜想这大概只等于费希尔博士半小时的收入吧。很多年以前他发明了一种“爱齿花”牌牙膏，一下子发了家；这种牙膏据说可以抵制由于过分贪吃我们生产的巧克力而引起的牙齿感染病。

“花”这个词汇的意思是指香味的选择，首批广告上展现了一束五颜六色的香花。“哪朵是您最喜欢的花啊？”后来的广告图片上人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半裸的妖艳美女，每人嘴里叼着一朵不同的花儿。

我憎恶费希尔博士倒不是因为他阔绰有钱。我憎恨的是他那股傲慢劲儿，那种对人世间的鄙视，那种冷酷无情。他谁也不爱，连他女儿也包括在内。他甚至连我们的婚事都没费神出面反对一下，因为他对我并不比对他那些所谓的朋友更加鄙视，那帮家伙只要他一点头就总会蜂拥而至，围聚在他身边。安娜一路易丝管他们叫作“癞蛤蟆”，她的英语说得不太准，她的意思当然是说“马屁精，”可我本人也很快就采用了她封给他们的这个绰号。这群癞蛤蟆当中包括一位名叫理查·狄恩的酗酒的男电影演员，一位名叫克鲁格的师长——瑞士军队只在战时才有一名将军，这个级别可说是蛮高了——，一位名叫吉甫斯的国际律师，一位税务顾问贝尔蒙先生，还有一位美国蓝发女人蒙哥马利夫人。那位将军——有人就这

样称呼他——已经退休。蒙哥马利夫人也圆满地守了寡。他们都为了同样的原因在日内瓦周围定居下来，不是为了逃避他们本国的税收，就是为了想利用这个地区的有利条件。我认识这群人的时候，只有费希尔博士和师长是瑞士籍人，而费希尔博士在阔绰上遥遥领先。他统治着这群人，就象一个人一手抡着鞭子，一手拿着胡萝卜，便可以驾驭一头毛驴一样。他们排列得整整齐齐，可又多么爱吃那些胡萝卜呵。也正是为了获得胡萝卜，他们才耐着性儿参加他举办的那些可恶的宴会，每次宴会上他们都先要受一番凌辱（“你难道就没有一丁点幽默感吗？”我想象得到他会在宴会刚开始不久就这样发问），然后才得到一份犒赏。后来他们竟然学会在玩笑还没开之前便咯咯发笑了。他们自认为是一帮精选出来的人——日内瓦有许多人因此而嫉妒他们同伟大的费希尔博士之间的友谊。（他到底是个什么博士我至今也没闹清楚，也许是他们发明了这个头衔用来恭维他吧，就象他们管那位师长叫“将军”一样。）

那么，我怎么会爱上了费希尔的女儿呢？其实用不着解释。她年轻漂亮，聪明热情，我直到如今一想起她还不禁泪水盈眶；可她对我的钟情真可以说是个难解的谜。我们相遇的时候，她比我小三十多岁，而且我身上也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吸引

一个象她那个岁数的姑娘。我年轻时当消防队员，在德国纳粹一场闪电空袭中失去了左手——那是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里的一个夜晚，整个伦敦陷入一片火海——。战争结束后，我得到的那份菲薄的抚恤金够我在瑞士住下来；多亏我双亲的培育，我所会的几种外语使我得以在那里勉强糊口度日。我爹是个小外交官，所以我童年时曾经在法国、土耳其和巴拉圭住过，学会了那几国的语言。纯属古怪的巧合，我爹妈在我丢失左手的那个夜晚双双丧命，他们被埋在康辛顿西区的一所房屋的瓦砾下面，而我那只手则遗留在利顿霍尔大街上的英格兰银行附近某处。

我爹和所有的外交官一样，晚年给封了个爵位：弗雷德里克·琼斯爵士——在英国并没有人认为这个姓氏由于加上了尊贵的头衔而显得滑稽或者异常。可是后来我发现，一位普普通通的阿·琼斯先生在费希尔博士眼里则是荒诞可笑的。算我倒霉，我爹一生把外交同盎格鲁——撒克逊历史研究结合在一起，于是他就给我取了个名字叫阿尔弗雷德，一个他心目中的英雄的名字，当然事先也征得了我母亲的同意（不过我相信她对“爱尔弗雷德”这个名字曾经有点踌躇）。这个教名，不知什么缘故，已经在我们中产阶级眼里变得卑贱了；它现在完全属于劳动阶级的名字

了，并且通常被简化为阿尔弗。没准儿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费希尔博士，“爱齿花”牌牙膏的发明家，从来不叫我的名字而干脆直呼直令地叫我琼斯，甚至在我和他女儿结婚之后也没改口。

可是安娜一路易丝——什么竟会使她对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产生好感呢？也许她在寻找一个比费希尔博士有感情的父亲，正如我自己或许也一直不知不觉地在作双重的寻求，与其说是寻求一个妻子，不如说是寻求一个女儿吧。我的妻子二十年前因难产而死，把胎儿——医生告诉我可能是个女儿——也一起带走了。我爱我的妻子，可是那时我还没有达到真正懂得爱情的年龄，或许当时也没有时间去爱。我怀疑一个人会不会终止爱，但是一个人却可以象他长大之后不再仰慕他年少时所仰慕的某位作家那样，轻而易举地不再去爱。我对妻子的怀念很快便淡薄了，倒不是忠贞不渝的感情不让我续弦——若能找到一个不在乎我的塑料假手和不体面的收入而愿接受我做为情人的女子，那简直近乎奇迹了，我也不敢奢想这种奇迹会再现。我在巧克力糖厂找到了一份差事，增添了一点收入，再加上我那份抚恤金和我继承下来的一点遗产（为数并不多，可是由于我的双亲把钱都投资在战争公债上，至少可以不用纳英国税），每逢我难忍难熬地需要女人时，即使

在瑞士，也总可以花钱去嫖嫖妓女。

安娜一路易丝和我首次相遇是在一次吃三明治的时候。我象往常那样叫了我的午餐；她呢，正要去韦维探望一位当过她的保姆的瘦小女人，在这之前先吃一份快餐。三明治还没给端来之前，我离开座位去一下厕所；我在椅子上放了一张报纸，好占住我那张桌子。安娜一路易丝没看见那张报纸就在桌子对面那把椅子上坐了下来。等我一回来，我想她必定是注意到了我那只残废手——尽管我在那只塑料假手上戴着手套——也许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她并没有道歉，也没有另换个座位。（前面我已经写过她为人有多么善良。她没有一丁点她爹那种性格。我真希望我曾有幸认识她的母亲。）

我们叫的三明治同时给端来了——她要的是夹火腿的，我要的是夹干酪的；她叫了咖啡，我叫了啤酒。那位女服务员一时有点慌乱，还当我们俩是一对伴侣呢……于是，十分突然地，我们俩就真的象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再度相逢似的。她那赤褐色头发象是涂过一层法国光亮头油而带有一种光泽，盘在头顶上方，用一个贝壳式的发夹别住，中间插了一根长针，我猜想这是所谓的中国发式；我即使在彬彬有礼地向她道早安，心里也都在幻想我要是把那根长针拔下来，那个贝壳发